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和形成路径新探

叶秀娟 (湖北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时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方法以及解放初期的市场大波动的分析,探讨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和形成的路径,认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而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照搬苏联论”是不科学的。

关键词: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路径

中图分类号: F04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2007)05-0038-05

一、问题的提出

苏联和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路径选择和两种截然相反的改革结果,引起了学术界对中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关系的重新思考。如果按照以前对中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关系的定位,即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对原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照搬,是无法解释中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两种不同路径选择以及改革的两种不同结果的,要从理论上对中苏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的不同路径选择以及不同结果做出科学阐释,必须探求造成中苏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改革路径的选择不可能是改革者主观意志“偏好”的产物,而是改革者依据经济体制自身的内在矛盾和体制本身^①的特点选择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国和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的不同路径是和中国和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之间差异性和不同特点的反映,而两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和不同特点是由两国计划经济体制产生和形成的不同路径所决定的。因此,有必要突破思维的束缚,对中国和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产生和形成的路径做新的探讨。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产生和形成的路径已经形成了共识,在此,本文只探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和形成的路径。

二、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照搬论”及相关分析

关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起源一直是中

国照搬了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照搬论”观点占主导地位,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三:

1. 中国没有计划管理的经验,除了照搬苏联的经验,别无选择。李振中认为,中国计划管理是从零开始的,“旧中国没有计划管理、解放区没有计划管理,这就是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曾有过计划管理的实践,当然也就不存在计划工作的基础,更谈不上利用自己的经验”,^[1]因此,中国实际上照搬了苏联的经验。董辅仁也认为,“在缺乏管理国民经济经验的情况下,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就成为我们学习的模式”,^[2]“我们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经济管理的一整套作法”。^[3]等等。

中国究竟有没有计划经济管理的经验呢?笔者认为,虽然中国没有对全国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经验,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中国局部从事大量的经济工作。1931年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在各根据地特别是中央根据地对经济活动实施了一定程度的计划管理。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经济计划管理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不仅有过局部经济计划管理的实践,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和成熟的局部经济计划管理的经验和方法。所以,说中国没有计划管理的经验是不符合实际的。

2. 中共领导人曾经多次讲过要向苏联学习。“照搬论”者常常用中共领导人向苏联学习的讲话来判断中国照搬了苏联的经济体制。

收稿日期:2007-07-15

作者简介:叶秀娟(1977-),女,湖北孝感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新近公开的苏联档案表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早在建国前的确讲过要向苏联学习。^[4]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秘密访问毛泽东时,毛泽东曾经向米高扬表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党比较,经验不足,因此他请莫斯科给予“指示和领导”,并再三强调要遵循亲苏路线。^[5]然而,米高扬在20世纪60年代的有关报告中称,毛泽东这番谈话是“东方表示谦虚的一种手法”。米高扬认为,中国取得胜利,中共不是机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在考虑中国的特点和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加以运用的,他甚至承认中国革命走的是“自己的路”。^[6]那么,毛泽东讲话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因为在南斯拉夫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后,出现了这样一种猜测:中国可能走独立于苏联的道路。所以,毛泽东是要使斯大林相信,他是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的。后来科瓦廖夫证实:毛泽东当时极力谋求消除斯大林的不信任。^[7]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也曾对斯大林表示,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弟弟”,中国永远向苏联学习。刘少奇坚持谦虚态度的原因之一是,也是要通过向莫斯科表示忠诚,以打消流传甚广的、毛泽东是铁托的疑虑。^[8]其实,毛泽东曾经给米高扬也说过,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表现了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的方法,结果导致了失败。^[9]因此,笔者认为,中共领导人向苏联学习的讲话只是一种政策需要。过去,中共领导经常感到共产国际的约束所带来的麻烦,现在他们岂愿再回到受约束的状态。^[10]

解放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苏联时,同样表达了要向苏联学习的思想。其用意与以前一样,是为了消除斯大林对中国的疑虑,因为斯大林依然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铁托式的人物。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讲话的真正意图。即使斯大林对中国经济发展有过一些善言,也从来没有引起中国的在意,更不用说把苏联的东西搬到中国。1950年,斯大林曾对刘少奇和王稼祥等人强调,发展经济必须踏踏实实,稳步前进,不能试图超越阶段,而应循序渐进,否则会把经济搞乱。^[11]但是中国并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忠告,1958年还是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这里我们也许能够更好的领会中国选择自己道路的决心。因此,中共领导人多次讲要向苏联学习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策略。中国不想由于对苏联的不敬,而被社会

主义“老大哥”强行赶出社会主义阵营,背上“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骂名。同时,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留在社会主义阵营,才能获得一种安全感。这才是中共领导人多次讲要向苏联学习的实质所在。

3. 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实际指导。一些“照搬论”者认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专家在中国依据苏联经验设计,并在其指导下完全按照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建立起来的。

不可否认,1952-1953年,的确有许多苏联专家在中国的请求下来中国指导建设。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既有技术专家,也有一些计划管理专家。但是,计划管理专家“鉴于中国的较低的发展水平,他们深感无用武之地,因此,他们不久陆续返回了苏联”。^[12]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苏联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苏联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不同,要用苏联的经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要把苏联的模式搬到中国,苏联专家也深感力不从心。因此,苏联专家给中国传授了多少苏联经验,或者在中国照搬苏联体制方面,苏联专家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把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归因于对苏联体制照搬的作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共领导人的工作作风。“自长征一来,毛泽东就没有接受过任何莫斯科的指令。从1942年到1943年的整风运动一来,他的社会主义在精神上已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13]在20世纪30年代,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维埃中国会受莫斯科的控制吗?毛泽东答道:要是出现那种局面的话,那么“把铁路修到火星上去也有可能了。”^[14]这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坚持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自己做主的决心,和中国问题必须按照中国方式来解决的坚强信心。毛泽东在中苏分歧达到顶点之前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说,今天,教条主义者鼓吹模仿苏联,我很想知道,以前苏联模仿谁。他还讲道,为什么总是中国模仿苏联,而不是苏联模仿中国,他坦率地宣布中国比苏联有“更丰富”的经验可以汲取。^[15]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以来,就没有迷信过别国的经验或模式,一贯坚持从中国自己的实际出发,探求适合中国自身的革命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走的是一条武装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苏

联革命道路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不愿照搬别国的革命模式,也更不愿别国把它的任何模式强加于中国。尽管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革命一样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然在艰苦的革命时期,中国没有照搬别国的模式,那么在革命成功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同样也不会照搬别国的模式和经验。

三、历史经验和方法: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和形成的基础

与联共(布)不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时期,也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在物资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的是局部集中和局部计划管理制度。这种局部集中和局部计划管理的历史经验和方法为中国解放后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以及可以运用的经验和方法。

1. 在财政方面。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后,起初在财政方面,各根据地采取自筹自支、分散管理的办法。尽管这种办法灵活机动,有利于各根据地根据本地区的情况搞好财政经济工作。但产生了各自为政、苦乐不均等状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后来,有些地方加强了财政管理,要求在县级以上的范围内实行集中管理。^[16]1931年,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条例》和统一财政的训令要求建立各级财政组织系统和预决算制度,并指出,一切税收概由中央财政机关征收,地方政府不得自行征收,各级财政机关的一切收入都要送交中央财政部,不得自行支配。这种财政体制已经明显的反映出了它的集中性。不分中央与地方,不分经常性收支和临时性收支,不分集中性收入和零星性收入,由中央把一切收支统管了起来。^[17]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相继实行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管理体制。此外,从1942年起,一些根据地开始编制年度财政收支概算。为了克服分散经营的弊端,1942年各根据地先后又实行了“统筹统支为主,生产自给为辅”的财政体制。由于这种体制过于集中,缺乏灵活性,于是1943年又改行“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的体制。这一体制一直沿用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开始,实行大区财政统收统支,大区内实行二级或三级管理。这种“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体制“为我国解放后几十年的财政体制提供了基本模式和主要框

架”。^[18]

2. 在农业方面。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要求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二苏大”的《报告》中指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对于某些重要的农产做出相当的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19]为了农业生产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从1933年开始,在苏区,自上而下地制定了农业生产计划。中央土地部制定的农业生产计划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季节性生产计划,即按照农事季节分别制定出计划。这种生产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下达各种农产品,尤其是稻谷的生产指标;另一种是农事活动计划,如开荒计划、植树计划等。

3. 在商业和价格方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特别重视商业的发展,保障革命根据地的供给。在根据地建立公营商业企业的同时,还要求要“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20]为了加强对外贸易(主要指区域间的贸易),工农民主政府直接经营若干重要物资的贸易。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外贸易上,依然对重要物资实行由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专卖。^[21]陕甘宁边区设立了土特产和盐业专卖公司,解放区于1943年成立了“中华商业公司”专门进行大宗商品的对外贸易。^[22]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垄断对外贸易的情况已初显端倪。1947年,统一对外贸易,一切出口贸易都由贸易总公司管理。

稳定物价也是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地和解放区主要依靠集中掌握大量物资,调剂供求来稳定物价。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一套成功稳定物价的经验。即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根据情况调整价格。具体的作法是通过高、中、低三种价格的浮动,使物价保持在中价水平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集中收购和集中抛售。^[23]

4. 在金融方面。在革命战争初期,为了保障军需供给,革命根据地也非常重视金融工作。1929年第一家苏区银行——东固平民银行诞生。1930年改为赣西南银行。江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以后,建立了全省统一的江西工农银行。1931年工农中央银行成立,1931年3月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发行根据地统一的纸币。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国家银行改为边区银行,1941年开始发行边币。为了保持边币的稳定,边区政府采取

积极政策与法币进行不懈的斗争,并积累了丰富经验。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与同年12月11日开始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北平解放后,中共人民银行迁至北平,负责接受国民党的金融机构,迅速成为了全国的金融中心。这为以后中国金融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5. 在国营工业管理方面。革命根据地的公营工业,最初都是由各根据地用自己的财政收入开办起来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由于统一了财政,各根据地的公营工商业就由中央政府财政拨款的投资方式来促进其发展的。公营工业的生产是按照战争的需要进行的。工业企业基本上是由各解放区政府经营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企业。“东北的国营经济,由于过去的特殊历史条件,较其他解放区都要发展。所有大企业,差不多都掌握在国家手中。”^[24]在这期间,政府积累了大量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制度的经验,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国营工业管理的原则,如在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上,加强对工业的计划性,对企业要实行一元化和集中化领导等等。

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在解放战争时期逐渐趋于成熟和完善。这种经济体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是一种目标单一的经济体制。它以革命战争需要为目标,并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宗旨的战时经济体制。在一切为了革命战争胜利的时期,政府的财政、商业、工业、外贸等体制及政策都主要是为革命战争服务,并为革命战争服务为第一需要。因此,这种体制能够把十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革命战争最需要的地方。第二、它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战时经济体制是建立在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基础上的经济体制。在解放区,尽管几乎都是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没有规模较大的现代化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解放区政府利用自己建立的一些少量公营工商业进行有利于战争需要的资源配置。因此,在这一体制,中国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第三、它是一种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经济管理体制不仅能够灵活适应局部战争需要,且又不失整体主义原则。因此,这种经济体制有利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和资源来支持革命战争。战时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战争时期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和战争实际需要所做出的重大选择,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一体制不可能

不对建国后经济体制的产生和形成发生一定的影响。

四、解放初期的市场大波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产生和形成的逻辑起点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和形成与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产生和形成的逻辑起点都是工业化,并认为中国与原苏联有着相同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因此,中国以1953年的工业化为契机掀起了学习苏联体制的高潮,开始了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照搬。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在1953年工业化开始以前,已经发生了先于中国工业化的制度变迁。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起源的逻辑起点是中国解放初的市场大波动。新中国成立前,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依靠市场进行调节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市场大幅波动,使全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猛长的局面,同时,财政极度困难。例如物价上涨幅度:1950年1月19日止,全国物价平均上涨30%。1950年2月,各大城市25种主要商品价格指数比上年12月上涨103%,3月比12月上涨126%。^[25]国家面临着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因此,稳定市场是新中国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项主要经济工作任务。为了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实践中,早已经形成了一套上面已经系统论述了的经验和方法,如统一财政、发挥公营经济的作用、政府掌握重要物资等等。

由于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与解放前在解放区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具有很大的相同性,中国共产党人必然会运用自己熟悉的方法来解决解放后所面临的同样的社会经济问题。由市场而产生的物价飞长以及急剧通货膨胀问题,依靠市场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因此,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就按照在革命战争时期管理经济活动的惯例,在各种经济活动上逐渐附加了各种各样的行政手段,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这些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之中。

从1950年开始,在统一全国经济的同时,中国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经济管理机构,形成了计划经济运行机制,到1952年已经初步搭建起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比照1952年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战时经济体制,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相同之处。两种体制都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地方分权”体制。所以,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从开始形成起就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运用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方法在解决解放初市场大波动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由市场大波动而引发的经济权力不断集中统一的运作,使一个政府主导型的计划经济体制雏形初步形成。而且中国利用这一经济体制成功的平抑了物价,治理了通货膨胀,有效的解决了市场大波动问题。解放初,中国利用历史的经验和方法对经济治理整顿的巨大成功,不仅证明了历史经验和方法的正确性,而且增强了中国广泛利用这一历史经验和方法的信心。

参考文献:

- [1] 李振中. 计划体制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太学出版社, 1991.6.
- [2][3] 董辅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30,260.
- [4][5][6][7][9][10][11][德]迪特·海芮茨希. 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256,257,319,364,345, 384,399.
- [8] [俄]A·M 列多夫斯基. 斯大林与中国[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70.
- [12][16][19][20][21] 赵效民.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M].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123,280,340,280.
- [13][14][15][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M].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7,94.
- [17][23] 李炜光.中国财政史述论稿[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221,202.
- [18] 丛树海. 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中)[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913.
- [22][24][28]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53,54-55,62.
- [25] 张闻天文集(4)[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17.

(责任编辑:许桃芳)

A New Probe into the Path of the Emergence and Formation of China's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System

YE Xiu-juan

(School of Politics &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methods of economic work in the long-term revolutionary struggle period and that of the major market undula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liberatio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path of the emergence and formation of China's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system and holds that the system is the result of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is of a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us the statement that China's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system is copied from that of Soviet Union is not correct.

Key words: China;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system; path